

简论魏晋南北朝清谈

宋瑜

(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,甘肃兰州730070)

[摘要]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们重要的精神支柱,清谈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价值。清谈由清议发展而来,两者在内容上有所区别。清谈的内容到最后发展成了纯粹的哲学命题,其形式也多种多样。清谈未必误国,其在文学、哲学发展方面有重要作用。

[关键词]魏晋南北朝;清议;清谈

[中图分类号]K235 [文献标识码]A [文章编号]1005-3115(2013)08-0031-02

一、清谈与清议的区别

要想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清谈有一定的了解,就应该先弄清楚清谈与清议的区别,毕竟近代学术界都认为“清谈之风起清议”。从出现的年代来看,徐斌认为“正始玄学的出现,是特定时代与社会的呼唤,并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萌芽、出现、发展和成熟的过程,这个过程依次展现为汉代清议……建安风骨——正始之音”。^①由此看来,“清议”一词最早出现在汉末晋初,即“正始之音”发端之初。徐先生认为,清谈出现在竹林玄学之后,江左玄学之前,这一中朝时期,即晋惠帝在位的西晋中后期。之所以这样认为,是因为在这期间,曾一度沉寂的玄学重新活跃,掀起一股席卷士林的清谈之风。因此,清议代表汉末晋初的玄学主流特征,而清谈则代表西晋中后期的士林玄学之主流特色。

所谓清议,一般认为是公正的评论或舆论,它既是政府选用官员的依据,又是这种选官方式的产物。清议的人一般指远离权力中心的人,其寥寥数言便可决定士人们的进仕之途,可见清议的权威性。如东汉汝南名士许邵,因主持乡里月旦评而著称于世,就连曹操也三番五次地去找他品评,迫于无奈,许邵评曹操为“治世之能臣,乱世之奸雄”。在中国封建社会,既与权力中心保持一定距离又对政治感兴趣的人,基本都是士人阶层,所以清议是联系士人与朝廷之间的纽带。而清谈的兴起,是因为东汉末年,党锢之争使得许多名士遭到了严重的压迫和摧残,为了能够继续生存下去,他们不得不表现出对政治的淡漠,将原来具体评议政治得失、人物品行高下,转为评估人物才能大小,再转为谈论不涉时用的抽象名理。这样,清议就变成了清谈。

总之,在形式上,清议表现为社会舆论,清谈则是学者之间的辩论;在内容上,清议侧重于具体人物的评价,清谈则重在事物规律的探求;在功能上,清议为官方选拔人才提供依据,清谈主要是表达一种伦理的或审美的识见。因而在品评标准上,清议更重德才,而清谈则更重人物给人的整体感受。例如:

五经纷纶并大春。(《后汉书·井丹传》)

王生一日千里,王佐才也。(《后汉书·王允传》)

这两则人物品鉴,一言儒家理论修养,一言人物的才干,自然是清议无疑。

见山巨源,如登山临下,幽然深远。(《世说新语·赏誉》)

王戎云:“太尉神姿高彻,如瑶林琼树,自然是风尘外物。”(《世说新语·赏誉》)

而这两则表达了一种伦理的或审美的识见,写出了人物给人的整体感受,所以其属于清谈。

虽说清谈是魏晋时期的主流,但陈寅恪认为清谈启自郭泰,成于阮籍。

郭泰是汉末著名人才评论专家、大名士,“性明知人,好奖训士类”,史称“泰之所名,人品乃定,先言后验,众皆服之”。郭泰为党人之一,他为了避免“党锢之争”的迫害,此后“不为危言覈论”和“周旋清谈闾阎”之间,即不具体评议中朝人物,而是抽象研讨人伦鉴识的理论,才得以保全性命。

至于阮籍,性格孤傲,蔑视名教,曾以“白眼”视“礼教之士”,官至步兵校尉,后与司马氏不合,日日醉酒,少有醒时,遂得苟全性命。他不拘礼俗,以其独有的方式消极反晋,虚与司马氏委蛇。其言必玄远,脱离实际,不对时政政治妄加评判,以免祸从口出,因此被司马昭认为是“天下之至慎”。至此以后,这种将具体评论政治是非的言论全部变为抽象的玄理,清谈之风由此而盛行。

二、清谈的内容与形式

汤用彤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《魏晋玄学论稿》一书中指出,清谈的核心内容是所谓的“三玄”,即《老子》、《庄

子》、《周易》三部书。最早把这三部书合称为“三玄”的,是北齐颜之推所著《颜氏家训》。该书第三卷《勉学篇》说道:“何晏、王弼,祖述玄虚,递相夸尚,景附草靡……直取其清谈雅论,辞锋理窟,剖玄析微,妙得入神,宾主往复,娱心悦耳。然而济世成俗,终非急务。泊于梁世,兹风复阐,《庄》、《老》、《周易》,总谓三玄。”

清谈家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内容,除了“三玄”之外,还有本末有无之辨、才性四本之论、自然名教之辨、言意之辨、圣人有情无情之辨、名家理论之学、佛经佛理、养生论、声无哀乐论、形神之辨及鬼神有无论。这些论题有的从“三玄”中提炼出来,有的则随着玄学清谈的发展而来。这些论题刚开始还和社会现实有些联系,慢慢发展到最后就变成了完全脱离社会现实的纯粹哲学命题。

清谈的形式包括许多方面,诸如清谈的场所、清谈的对象、清谈的程式安排、清谈时运用的术语、清谈时使用的道具等。

就清谈的场所来看,名士们大多都不怎么讲究,在意的是清谈的对象和话题。他们大多比较随性,不拘一格,追求精神上的满足感,所以绝大多数清谈都是在私人家中进行的,甚至有些是在床上进行的,如东晋名相王导和殷浩的一次清谈就是在蚊帐里进行的。当然,清谈也可以在其他场合进行,比如寺庙、野外、郊外等地方。

清谈既然成为士大夫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,那么,清谈家们则势必要摆出一副超凡脱俗的姿态来。所以清谈家们都喜欢宽袍大袖、高冠博带、手持麈尾、嗜酒如命,讲究风度气质。一般来说,清谈的气氛比较轻松随和,但也有激烈的时候,名士们以酒助兴,喝到高兴时甚至忘乎所以,肆无忌惮地相互用言语攻击对方,完全没有任何风度可言。例如:

孙安国前往殷中军处共论,往返精苦,客主无间。左右进食,冷而复暖数四。彼我奋掷麈尾,悉脱落,满餐饭中。宾主遂至莫忘食。殷乃语孙曰:“卿莫作强口马,我当穿卿鼻。”孙曰:“卿不见决鼻牛,人当穿卿颊。”^②

孙安国到殷浩处谈论,彼此交锋,反复争辩,客主双方都没有间歇。左右盛来饮食,冷了再热,热了又冷。如此反复数次,都来不及吃。辩论越来越激烈,两人使劲儿挥动麈尾,麈尾毛脱落在食物中。直到天色渐渐暗下来,都忘记了吃饭。场面如此激烈,一代名士们为了能够驳倒对方的观点而

争得面红耳赤,毫无风度可言。

三、对清谈误国的辨析

清谈家们好为玄远,表现在政治上就是“不以物务自婴”的风气,而在社会上就形成了放任怪诞之士风,所以人们都说“清谈误国”。西晋傅玄在《举清远疏》中的一段有名的话最能说明问题:“近者魏武好法术,而天下贵刑名;魏文慕通达,而天下贱守节。其后纲维不摄,而虚无放诞之论,盈于朝野,使天下无复清议,而亡秦之病,复发于外矣。”范宁更将“礼崩乐坏,中原倾覆”的责任归诸王弼、何晏,指斥“二人之罪,深于桀纣”。^③就连清谈名士如王衍、桓温、王羲之等人,也都或自责或反省,将亡国之咎归于清谈。王衍在临死之前说:“呜呼!吾曹虽不如古人,向若不祖尚玄虚,戮力以匡天下,犹可不至今日。”^④表明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。

然而,清谈真的能误国吗?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,学者们讨论清谈的意义,大多从哲学思想史及文化发展史的角度入手,重新认识魏晋清谈的价值。1934年,容肇祖在其书中开篇第一节写到“何晏、王弼的冤狱”时,较为系统地整理了何、王、阮、嵇、向、郭等魏晋清谈家的思想,并认为何、王之思想“实为魏晋间的第一流”,^⑤从而肯定了清谈积极的一面。现在,这种思想几乎主导着整个学术界对清谈的认识和评价,如孔繁认为:“清谈主要是剖玄析微,阐扬老、庄义理,在我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……清谈对于消弭士族各集团间的激烈斗争有帮助,于动乱之中求得相对安宁,对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以及江南地区的开发,也是有积极作用的。”^⑥蒋凡也在其著作中专列《清谈未必定误国》一章,指出:“玄理清谈对于中国传统思维的发展,特别是对于理论思辨,曾起了积极的作用……魏晋清谈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,它冲击着传统儒家经典,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。”^⑦

从《世说新语》看魏晋清谈,其对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。“虚谈废务,浮文妨要”,的确无益于政治。但从文学流变角度来看,清谈的内容着重强调了人的社会美和自然美,在人物品藻中运用了“风骨”、“情致”、“形神”等词藻,丰富了我国古代的美学范畴。从哲学发展变化趋势来看,清谈析理精微,文辞简约,相比于汉末儒学的粗糙与繁琐,确实有所进步,抽象思维能力也有所提高,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儒、释、道三家思想的融合,这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。因此,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清谈,我们应采取辩证的态度去研究分析,努力探究清谈的实质及其引发的积极的社会意义。

【注 释】

①徐斌:《魏晋玄学新论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,第191页。

②余嘉锡:《世说新语笺疏》,中华书局1983年版,第732页。

③房玄龄:《晋书·范宁传》,中华书局1974年版,第1984页。

④房玄龄:《晋书·王戎传》,中华书局1974年版,第1238页。

⑤容肇祖:《魏晋的自然主义》,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,第30页。

⑥孔繁:《从〈世说新语〉看清谈》,《文史哲》,1981年第6期。

⑦蒋凡:《世说新语研究》,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,第69~138页。